

【史学博士论坛】

泛民族主义的悖论

——以19世纪泛斯拉夫主义与俄土战争为例

王云龙

(东北师范大学 中古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19世纪, 泛民族主义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出现。泛民族主义在东欧斯拉夫地区, 形成了泛斯拉夫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 为沙皇俄国实行大民族利己主义的工具。泛斯拉夫主义的本质与特性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 得到充分的展示。大民族与小民族的利己主义, 在这场战争中可一览无余。

【关键词】 俄土战争; 泛斯拉夫主义; 沙皇俄国

【中图分类号】 K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3541 (2006) 05 - 0089 - 04

Contradiction of Pan - Nationalism

——Taking Pan - Slavism in 19th and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 as an Example

WANG Yun - long

(Institute of Research in the Medieval World Histor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In 19th, Pan - Nationalism appeared with the rising of Nationalism. Pan - Nationalism formed Pan - Slavism in the region of Slav of East Europe.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it became the tool which Czar Russia carried out big - nationality egoism.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 of Pan - Slavism was fully showed in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 in 1877 - 1878. The egoism of big - nationality and small - nationality could take in everything in a glance in this war.

Key words: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 Pan - Slavism; Czar Russia

在现代文明的普世性背景话语下, 传统文明特殊性的合法性来源与确立, 已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特殊性的本体论形式, 而是依托现代文明的话语范式, 构造传统特殊性内涵的普世化话语。泛斯拉夫主义就是19世纪后半叶, 俄罗斯特殊性普世化的合法性载体。在历时性语境中, 俄罗斯特殊性有着不同的普世化合法性载体, 如中世纪的“第三罗马”, 19世纪的“泛斯拉夫主义”。泛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传统文明特殊性对抗现代文明普世性的一种形式。俄罗斯特殊性的普世化载体, 从彼得大帝开始, 借取来源于西欧文明的普世性话语范式, 用特殊性内涵更替其原初的质的规定性, 使现代性取向的普世化发生异化、逆转, 沦为传统化特殊性解构现代化普世性的物质手段、制度工具和精神武器。

族主义像幽灵一样纠缠了欧罗巴, “这种民族政治理念与新意识, 皆诞生于1789年, 也就是法国大革命那一年。”^{[1](p.122)} 民族国家是近代国际社会的独立主体, 是法国大革命的国际性政治遗产。自此以后, 人民认同的国家不再是君主的一人之国, 而是民族的万众之国。君主, 如拿破仑等, 只是这个民族国家的人格象征, 而不是其全部。“这正是法国对人类历史最大的贡献。”^{[1](p.104)} 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 作为欧洲大陆人口最众、分布最广、差异最大的族群——斯拉夫人产生了“泛斯拉夫主义”, 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内蕴。“泛斯拉夫主义起源于西斯拉夫人中间。”^{[2](p.93)} 斯拉夫人分为三个支系: 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小俄罗斯)人组成的东斯拉夫人, 信奉东正教, 国家形态为欧洲列强之一的俄罗斯帝国, 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国际宪兵; 由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组成的西斯拉夫人, 信奉天主教, 极少数信奉新教, 分别被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统治; 由保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一方面重构了欧洲的社会政治版图, 另一方面唤起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从此以后, 民

[收稿日期] 2006 - 03 - 02

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组成的南斯拉夫人，信奉东正教、天主教，分别被奥地利和奥托曼土耳其统治。斯拉夫人之间的矛盾，如波兰与俄罗斯，比与其他民族的矛盾还要深，斯拉夫人没有共同的文化归旨，比邻而居，宗教迥异，像同在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克罗地亚人则信奉天主教。除俄罗斯外，其他斯拉夫民族都是分布在各个帝国或王国中被压迫民族，没有形成单一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客观情势使得斯拉夫民族走上不同于西欧的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1848年，西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意大利、德意志等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要求扫除封建势力，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争取实现统一，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1848年6月2日，奥匈帝国各地的斯拉夫领导人聚会布拉格，召开斯拉夫人大会，宗旨为帝国制宪议会做准备。与会代表分为三部分：西部斯拉夫人——捷克人、西里西亚人、斯洛伐克人；东部斯拉夫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南部斯拉夫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等。会议通过决议，呼吁加强帝国内包括斯拉夫人在内的各民族团结，抵御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浪潮，吁请沙皇俄国制止革命蔓延。泛斯拉夫主义的第一个文本就包含伴其始终的内在悖论性：既是被压迫民族，又是“反革命的民族”^{[31](p.203)}。恩格斯针对泛斯拉夫主义在1848年革命中的表现，指出：“如果斯拉夫人在他们受压迫的某一时刻开始新的革命历史，那么他们仅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自己是具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就会要求他们求得解放。”^{[31](p.209)}1848年革命失败后，泛斯拉夫主义者没有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相反却认为革命失败恰好证明依恃强权取向的正确性。

泛斯拉夫主义从19世纪上半叶在西斯拉夫人中萌发，到19世纪中期异军突起，带有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性。这就是，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已经有了民族自觉，但却把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于同为斯拉夫民族的外部强权——沙皇俄国。1839年，一个匿名的西斯拉夫学者出版一部名为《欧洲五巨头》的书，主张全体斯拉夫人在沙皇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其后，一些俄罗斯以外的斯拉夫知识分子大力倡导斯拉夫民族的兄弟情谊与团结。19世纪50年代初期，泛斯拉夫主义者并没有得到沙皇的善意回应，“俄国政府根本没有按泛斯拉夫主义准则行事的意图”^{[41](p.288)}。尽管沙皇政府对泛斯拉夫主义不可置否，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19世纪上半叶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大辩论中兴起了一股大俄罗斯主义思潮，与其殊途同归。大俄罗斯主义者从语言文化角度，来论证俄罗斯的大国领导地位，波兰华沙大学教授安敦·布迪洛维奇主张，俄语是“全体斯拉夫人”的，此说“体现了俄国在斯拉夫运动中领导地位”^{[21](p.114)}。大俄罗斯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融合的主要代表人物米哈伊尔

波高金，把俄罗斯帝国作为泛斯拉夫主义实现的形式与目的。他写道：“俄国——在世界舞台上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现象……以宏大而论哪个国家能比拟？……有人口六千万，此外还有那些没被计算在内的。……让我们在这大量人口外，再加上三千多万我们的兄弟亲戚，即斯拉夫人……今天斯拉夫各民族中哪一个居于首位？以数量、语言和全部特质而论，哪个民族会被认为是整个斯拉夫世界的代表？”^{[21](pp.105-106)}俄国政治家萨马林在1842年写道：泛斯拉夫运动的目标是“提高俄国的地位并且在集中表现方面和斯拉夫精神的完善方面全面地提高俄国的地位。……斯拉夫人精神只有在俄国才实现了出于无私的自觉。”^{[21](p.107)}俄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分析道：“把自己的民族当作宣扬普遍真理的优秀使者来崇拜；其次是把这些民族当作自然力来崇拜；而不考虑普遍真理；最后是崇拜那些民族界限和反常现象，一致因直接否定普遍真理的理想本身，而把民族分割开来。”^{[21](p.101)}泛斯拉夫主义进入到俄国，开始了它的异化历程，首先，由斯拉夫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理想转变以沙皇俄国的利益为准则；其次，斯拉夫各民族不再是平等的，而是要接受俄罗斯的领导；第三，“泛斯拉夫主义，卒成为俄罗斯帝国主义扩张及帝国化的工具。”^{[51](p.99)}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传统中，一向存在着以自身特殊性为内涵的普世化倾向，从“第三罗马”到泛斯拉夫主义一脉相承。

二 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是泛斯拉夫主义思潮达到顶点的产物。19世纪上半叶，沙皇俄国是欧洲的宪兵，是维护1814—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支柱，特别是在扑灭1848年革命中，沙俄“居功至伟”。俄罗斯是既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而泛斯拉夫主义虽有寄望于俄罗斯的保守性，但又具有民族自觉的革命性，这很可能破坏维也纳体系。因而，尼古拉一世对频频向其示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视而不见。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俄国官方对境内外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漠视转为重视。俄国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维持欧洲均势的维也纳体系，因英法支持土耳其抗击俄国，而分崩离析。俄国更加关注在巴尔干地区自己的战略利益，不再以欧洲宪兵自居，由欧洲大陆列强中的平衡性力量，转为在纷争复杂的欧洲南部的进取性力量。俄国的战略意图是一方面利用、支援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削弱奥斯曼土耳其，取得进入地中海的出海口；另一方面，又约约束南部斯拉夫民族独立斗争，不要危及土耳其的存在，俄国需要一个虚弱、依附于自己的土耳其，从而避免使其解体，作为抗衡欧洲其他列强的筹码。在巴尔干问题上，泛斯拉夫主义与沙皇俄国既互相倚重又目的迥异。西方学者指出：“亚历山大二世成了泛斯拉夫主义的牺牲品”^{[41](p.304)}。19世纪中叶，俄国境内的泛斯拉夫主

义开始高涨，到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半岛危机时，达至鼎盛。1857年，波高金等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莫斯科组建“斯拉夫福利委员会”，其目的是帮助南部斯拉夫民族恢复与发展斯拉夫文化，如建筑东正教教堂、普及斯拉夫语言教育等。1867年，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次泛斯拉夫大会。但是会议的结果与沙皇政府及俄罗斯知识界的预期相反，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成为大俄罗斯主义的独角戏。波兰人没有派代表出席，捷克代表明确拒绝以大俄罗斯主义取代泛斯拉夫主义，主张斯拉夫人的团结不应否定斯拉夫各民族的特性，而应兄弟般互助。这次大会标志着从西斯拉夫人中产生的泛斯拉夫主义，蜕变为大俄罗斯主义统一斯拉夫各族人民图谋的意识形态工具。俄国诗人丘切夫评论这次会议时，写道：“每件事都以斯拉夫人如何理解并如何感受他们和俄国的关系为转移。……如果他们只把我们看成一个友好的、同盟的、有益的，然而，是一个外国，那么什么事情也完成不了，而且我们还离（我们的）目标很远。只有在他们真正地理解了他们和俄国是一体，并且在他们感到由于对一个有机的共同体那种信赖而与俄国联系起来时，这个目标才能达到，而那个有机的共同体则把一个实体的所有部分都结合成真正有生气的某种实体。”^{[21](p.119)}这次会议在俄国煽起泛斯拉夫主义的新浪潮，“成为俄国从官方到民间同情境外斯拉夫人的公开展示，这在1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6](p.201)}

1875年，土耳其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人民起义。1876年4月，保加利亚发生起义。土耳其军队残酷镇压这些起义。同年6月30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向土耳其宣战。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土耳其军队在保加利亚实行血腥的恐怖政策，在欧洲称为“保加利亚惨案”。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情绪高涨，影响到了政府。泛斯拉夫主义者、沙皇驻土耳其大使伊格那切夫宣称：“只要10万俄军，就能消灭土耳其。”^{[7](p.20)}沙皇政府只想削弱土耳其，使其听从于俄国，而不是消灭它。巴尔干地区，如果没有了土耳其，英、法、奥地利就会大举进入，使本来就不太平的这一地区，更加不稳定。沙皇政府看到土耳其深陷于巴尔干斯拉夫民族解放斗争的泥淖，并不急于出手，需同欧洲列强协调好关系，把自己的战略意图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得到最大化的实现。沙皇既要支持巴尔干斯拉夫民族解放斗争，又要防止同在巴尔干地区有重大利益的奥匈帝国发生冲突。1876年，俄国派出4000多名志愿军，退役将军切尔尼亚耶夫还担任了塞尔维亚军队总司令。同时，亚历山大二世同奥匈帝国皇帝约定，击败土耳其后，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山将实行自治，塞尔维亚、黑山和希腊版图将扩大；俄国得到南比萨拉比亚和巴统；奥匈帝国得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部分；不支持巴尔

干斯拉夫国家的建立；使君士坦丁堡成为“自由市”^{[8](p.212)}。该协议使俄奥各得其所，奥匈帝国保证在未来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

1876年10月，塞尔维亚被土耳其军队击败，大公米兰向亚历山大二世紧急求援。沙皇政府支持大公米兰维护塞尔维亚主权的行动，于10月31日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在48小时内同塞尔维亚签约休战。土耳其慑于沙皇的威胁，接受这个条件。此时，一贯以操纵欧洲大陆列强均势盟主自居的英国登场了。英国维护摇摇欲坠的土耳其封建帝国，是把它作为在巴尔干地区制衡俄奥等欧洲大陆列强的战略筹码。英国与俄国达成土耳其给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自治的协议，并倡导召开包括土耳其等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落实这项协议。12月23日，会议开幕伊始，土耳其全权代表宣布，土耳其最高统治者苏丹已把一部民族自治宪法赐给自己的臣民，因此，本次会议已无必要。英国与土耳其合演了一出外交双簧，俄国不甘于外交失败，加之国内泛斯拉夫主义情绪鼎沸，唯有与土耳其一战。1877年4月24日，亚历山大二世对土耳其宣战。6月底，两国开始交战。俄国群情激昂，“斯拉夫福利委员会”发起全国大募捐，“群众踊跃捐献，个人、城市或村社都慷慨解囊，捐钱赠物给军队和南部斯拉夫人，盛况好像回到了1812年。”^{[9](p.195)}俄国群众非常关心战争，有关战争报道的报刊销量激增，批评战争的言论沉寂了^{[4](p.305)}。甚至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倡导非暴力的伟大人道主义作家，在名著《安娜·卡列琳娜》中不惜重墨描述了男主人公沃伦斯基开赴俄土战争前线时的场景。1878年1月13日，在土耳其军队遭到俄军沉重打击的不利情况下，苏丹致书亚历山大二世求和。1878年3月3日，俄土签定圣斯特法诺条约。该条约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政治版图，规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完全独立，其领土也有所扩大；保加利亚成为自治王国，仍向苏丹纳贡；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自治；俄国取得南比萨拉比亚、巴统、卡尔斯、阿尔达罕、巴雅扎特等地；土耳其赔款31000万卢布。这项条约，使俄国同其他欧洲列强完全对立，俄国凭借此条约就可以在巴尔干地区处于优势地位，这是其他列强万难接受的。俾斯麦提议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和德、英、法、奥、意、土和巴尔干各方代表与会。1878年7月13日，签定《柏林条约》，规定：保加利亚北部自治，须向苏丹纳贡，南部实行行政自治，仍隶属于土耳其；马其顿和色雷斯归土耳其；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独立；俄国得到南比萨拉比亚、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罕，巴雅扎特归还土耳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奥匈帝国占领；土耳其赔款3亿卢布；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岛。俄土战争后，《柏林条约》使俄国在战场上得

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被别人拿走了一些。这种外交失败激化了俄国国内矛盾，引发了民粹主义新浪潮，亚历山大二世毙命于民粹主义者的枪口下。《柏林条约》在法律上确认了南部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斗争成果，同时又留有隐患，巴尔干半岛继续处于动荡不宁中，使该地区成为欧洲的“火药桶”，在20世纪初，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问题遗存到21世纪，仍时有火星飞溅。

三

俄土战争后欧洲范围内的泛斯拉夫主义走向低潮，这是世界时间普世性力量对历史时间特殊性普世化势力的胜利。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阿克萨科夫徒唤奈何地发问：“这是你吗，罗斯胜利者犹如罪犯那样在被告席上对自己神圣获得的成果悔过，你将乞求宽恕你的胜利吗？”^{[8](p.226)} 俄土战争是泛斯拉夫主义高潮的标志，也是大国利用泛民族主义旗号，行扩张之实的典型例证。

在19世纪历史条件下，泛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变种，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内涵。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深刻地分析道：“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因为近代的民族主义与发展问题连到了一起，每一个民族都想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最有利的发展机遇。”^{[10](p.12)} 最初发起泛斯拉夫主义的西斯拉夫民族，由于信奉天主教，接受西欧启蒙主义文化较多，特别是波兰民族与俄国有着亡国之仇，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便与重心转到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逐渐分道扬镳。19世纪40年代，捷克泛斯拉夫主义者哈夫里切克到俄国做了一次旅行，使他的泛斯拉夫主义理想彻底破灭了，这种对俄国的幻灭感在西斯拉夫民族中比较具有典型性。他写道：“作为一个普通坚决的捷克人，甚至对斯拉夫这个名称怀着一些暗自痛苦心情而回到布拉格，因为对俄国更多的了解就使我对这个名称发生了怀疑。在俄国的酷寒气候和俄国生活的其它方面都使我心里仅有的一颗泛斯拉夫之爱的火花熄灭了。这些绅士已经在各处不论说和写都开始用斯拉夫人代替俄国人，以便尔后能够重新说俄国人以代替斯拉夫人……我能……证明，俄国人不是兄弟般地，而是狡诈地和利己主义地想到其他斯拉夫人。”^{[21](pp.102-103)}

俄国官方对于境外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不抱有利他主义的想法，而完全从民族自利角度加以利用。沙皇驻土耳其大使伊格纳切夫说：“奥地利和土耳其境内的斯拉夫人，都应成为我们反对日耳曼人的政策的同盟者和工具。俄国只有达到这一目的，才能替他们做出牺牲。”^{[21](p.127)} 俄国在“泛斯拉夫主义的伪装下，补充了这

个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于是，因四百年扩张的传统而被加强了俄国的国家目标，就比泛斯拉夫团结的理想更有影响。”^{[2](pp.131-132)} 塞尔维亚人作为南部斯拉夫人实力最强大的实体也是把泛斯拉夫主义作为谋取本民族利益的工具。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塞尔维亚统治者马利诺维奇宣称：“我绝不会组织志愿军去帮助俄国，或站在俄国一方参战。我甚至要告诫俄国人不要把战火烧到塞尔维亚，我们也不会同俄国的交战方结盟，我们不能为了少得可怜的利益而牺牲掉我们全体。”^{[9](p.6)} 南部斯拉夫民族完全以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对待泛斯拉夫主义。1876年，俄国因塞尔维亚与土耳其交战失利，宣布参战。塞尔维亚大表欢迎，同时要俄国每月资助100万卢布的军费^{[9](p.220)}。俄军遭受土军的包围，形势危急，塞尔维亚却按兵不动，害怕与俄军一道被土耳其军队消灭。塞尔维亚摄政布拉日那维奇向奥匈帝国求助，表示俄国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只要奥匈帝国出手相助，塞尔维亚愿意摆脱掉俄国。由于俄国援军及时赶到，彻底击溃了土耳其军队，奥匈帝国才没有能够插足塞尔维亚^{[9](p.17)}。在俄土战争期间，塞尔维亚没有按照泛斯拉夫主义的团结精神，始终不渝地与俄国站在一起，而是“依自己利益需要而行动。”^{[9](p.207)} 泛民族主义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民族利己主义面前必定暗淡无光，泛斯拉夫主义在19世纪的历程就证明这一点。因而，泛斯拉夫主义没有摆脱掉作为俄罗斯特殊性的普世化载体的历史宿命。

【参 考 文 献】

- [1]埃·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78.
- [3]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4]Saunders,D.“Russia in the Age of Reaction and Reform”.Longman,1994.
- [5]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 [6]Petrovich,M.The Emergence of Russian Pan-Slavism,1856-1870.New York,1956.
- [7]Rupp,H.G.A.Wavering Friendship:Russia and Austria 1876-1878.Porcupine Press,1976.
- [8]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9]Mackenzie,D.The Serbs and Russian Pan-Slavism 1857-1878.Cornell Uni.Press,1967.
- [10]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

[责任编辑 张晓校]